

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与满洲省委： 围绕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多边互动 (1931—1936)*

何志明

内容提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推行的重要策略,它从提出到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变化过程。东北地区是抗战时期中共初步践行统一战线的重要区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方针发生变化,使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就东北地区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出现了分歧,后者直接对东北党施加影响的做法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其直接面对中共中央与代表团之间的意见冲突而难以适从,进而对东北党乃至满洲省委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本案例可以发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存在与中共中央、地方党组织多边互动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 满洲省委 东北

引言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为了打击侵略者,东北地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日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关内的形势完全不同,怎样联合该地区其他武装共同抗战,成为摆在中共东北党面前的关键问题。东北由此成为中共早期践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区域。

检视目前学界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这些论著主要围绕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和东北抗联展开,例如中共代表团与东北抗日统一战线之间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驻华领事馆报告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921—1937)”(15BDJ053)的阶段性成果。在“第四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报告时,承蒙王先明、张生、黄道炫、杨东等先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申谢忱。文中与“满”“满洲”有关系的语句较多,为了避免误解不一一加上引号,请读者明察。

的关系、东北抗联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过程等。^①然而，作为东北统一战线策略执行者的东北党组织，至今尚未在相关研究中从“幕后”走向“台前”，以致东北党与中共东北抗战之间的关系长期呈现“雾里看花”之样态。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中央仍然强调各地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大背景下，东北党如何处理民族革命与苏维埃革命之间的关系，关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面对东北出现的各类反日武装力量，东北党必须积极与之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但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发展，看似与远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关系密切^②，实则体现了共产国际（苏联）对东北乃至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判断。但是中共中央与东北党接受其主张的过程并非类似“按电钮”的模式^③，而是经过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互动阶段，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就东北地区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对东北党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并决定了满洲省委的命运。因此，若将此时的东北党置于国际革命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可以更加形象地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共地方党策略方针变化之间的关系。

美国学者李庭植（Chong-Sik Lee）研究了苏联自身利益变化与1933年东北党实施统一战线的基本过程，特别是在争取东北义勇军问题上，触及到了中共党内对此存在的分歧^④，但未能进一步深入探究这种分歧与东北党自身遭际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以为，若深入考察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及满洲省委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而展开的互动过程，或许能发现新的问题与分析思路。例如：鉴于中共中央对东北既有苏维埃革命路线的坚持，共产国际是如何逐步对东北党施加影响的？面对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之间关于东北统一战线程度的分歧，满洲省委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这种分歧反映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对东北党生存状态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主要运用中央档案馆等编印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兼以其他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档案史料、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为补充，从地方党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九一八事变到满洲省委被撤销期间（1931—1936年），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和满洲省委就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发的多边互动。

① 谷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抗日联军——兼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长白学刊》2013年第5期；麻玉林：《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其作用》，《吉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蒋孝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② 黄一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李良志：《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编委会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1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5页；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

③ 黄宗智认为，党史研究极易存在“按电钮”的机械式理解误区，即认为从中央到基层支部的政令贯彻体现了一种简单“按电钮的关系”。参见黄宗智《评关于江西时期的几本西方著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中共党史译丛》第1辑，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2页。

④ 李庭植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中共与东北抗战的研究著作在西方学界颇具代表性，但此书存在一个明显的史实错误，因“一·二六指示信”为1933年初中共代表团起草，后被中共中央以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党，致使李误将中共中央视为指示信的作者，因而得出“中共中央在该指示信中照抄王明相关文章大段文字”的错误结论，而且在解释“一·二六指示”为何与“二月指示”（1934年2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党发出的指示信）内容明显存在差异之时，他只能以“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就满洲问题亦存在分歧”来回答。参见 Chong-Sik 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63, 184, 186。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北统一战线策略的分歧

东北党组织的发展起步较早,中共“一大”后,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时任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负责人罗章龙就曾于 1921 年至 1923 年前往东北考察工运并筹备建党工作。^① 1927 年 10 月,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并于 12 月 1 日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正式成立^②,由此开启了东北党组织的发展序幕。

根据中共六大的要求,满洲省委正式成立后不久,即决定在东北发动工运甚至武装暴动,并以此来推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在农村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没收所有地主土地,而在对待其他抗日武装的态度则体现为“下层统一战线”,即秘密联合其基层官兵,最后夺取该队伍的领导权。为了尽快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1930 年 8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在武汉、南京、东北等地举行起义和在上海实行总罢工,并认为东北的起义“具有最为重大的作用”。^③ 一时之间,东北党组织对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绪极为高涨。据韩光回忆:“当时我们是向中央苏区、向中国工农红军学习,凡是工作基础好的农村,都想成立苏维埃政权。”^④这种盲目性的武装暴动使东北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月余以来,北满、抚顺破坏损失最大——负责同志及中级干部损失太多,东满不久也遭到了大的破坏,因此目前满洲更十万分的感觉人才的恐慌”,而且中央巡视员陈潭秋亦在北满参加会议时被捕。^⑤ 在县一级,则是“全满各县几乎完全破坏,尤其是北满各县委举皆破坏,党的组织完全暴露”。^⑥

中共中央“全国总暴动”的计划被共产国际紧急叫停后,东北党也开始对“立三路线”进行纠正。1931 年 3 月 27 日,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检讨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承认“满洲的革命尚在开始发展,比起南方(尤其是苏区)是落后得很远的”。^⑦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此次挫折,满洲省委开始注意到东北地区与关内尤其是南方存在的差异,即认为此时在东北开展苏维埃运动并不适宜。但满洲省委的这种观点很快遭到了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1932 年 4 月 15 日,《红旗周报》登载《为创造北方苏区而斗争》一文,在批判“北方落后”观点的同时,对满洲省委的“消极怠工”进行了点名。^⑧ 而此后召开的北方会议,更是对这种“北方特殊论”进行了彻底否定。

1932 年 6 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五省(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代表联席会议,史称“北方会议”。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何成湘代表东北党参加此次会议。何在会上

^① 罗章龙:《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罗章龙回忆录》下册,台北,溪流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2—690 页。感谢安徽大学黄文治博士提示该书。

^② 《临字通告第一号——通告满洲省临委成立》(1927 年 12 月 1 日),《黑龙江党史》第 5 辑,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1985 年编印,第 1 页。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930 年 8 月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1921—1936 补编)》第 3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3 页。

^④ 韩光:《党史工作意义重大,主动服务义不容辞》,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页。

^⑤ 《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北满特委被破坏、孙杰被捕及目前工作等问题》(1930 年 12 月 18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6,中央档案馆等 1988 年编印,第 315 页。

^⑥ 《朝鲜工作委员会江宇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5 月 11 日),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历史资料》,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 页。

^⑦ 《中共满洲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 年 3 月 27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183 页。

^⑧ 楚均:《为创造北方的苏区而斗争》,《红旗周报》第 36 期,1932 年 4 月 15 日,第 27、30 页。

报告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党所取得的成绩与教训，并提出“满洲区与关内不同，有它的特殊情况”的看法。该观点当即遭到了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的批判，称“中国革命空前高涨，革命时机普遍成熟，任何省任何地区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满洲也毫不例外”，将其斥之为“满洲省委落后论”及“满洲省委特殊论”，并决定改组满洲省委，撤销了罗登贤的省委书记职务，任命李实（李抱一）担任新的省委书记，并将何成湘调整为宣传部部长。^①

1932年6月24日，北方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决议案，明确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对“北方落后论”进行了严厉批判：“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这种理论的结果，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②同时，北方会议还对满洲省委联合东北其他抗日武装上层领导人的做法予以批评。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壮大抗日力量，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派遣军委书记周保中前往宁安，先后与“自卫军”“救国军”首领取得联络，并担任其前方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成功策划攻占安图、敦化和宁安等县城。^③但该会议将这种联合其他抗日武装领导人抗日的做法斥之为“上层勾结”。^④该决议即为“上层勾结”一词的较早由来。言外之意，允许与义勇军下层士兵联合，但不得与其领袖合作，否则就是“上层勾结”。北方会议后，“上层勾结”遂成为制约东北各级党组织联合各路反日武装的“紧箍咒”。

为了贯彻北方会议决议，新任满洲省委书记的李实于1932年7月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满洲特殊论”，全盘否定了前届省委的工作，将罗登贤领导的省委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并将“创造满洲苏维埃与红军”作为东北党的中心任务。^⑤此外，满洲省委对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也持排斥态度，称要“独立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为创造满洲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⑥，而不是与之联合抗日。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满洲省委仍然坚持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⑦这种不加区别地将其他抗日武装视为敌对势力的做法，给东北党的抗日斗争带来了严重障碍。对此，我们可以从巴彦游击队的命运看出些许端倪。

巴彦县因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将驻地由沈阳迁至哈尔滨），成为省委贯彻北方会议决议的首选区。该县有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又称“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张曾为中共党员，尽管此时已脱党，但仍对中共抱有好感。1932年6月，罗登贤派遣赵尚志作为满洲省委代表（后任该军参谋长）前来参与指挥该部队。在张赵二人的领导下，部队于8月13日攻下了巴彦县城，在当地声威大震，并成为早期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的重要抗日队伍。^⑧为了传达北方会议决议与满洲省委最新指示，省委于该年10月派遣巡视员吴

^① 李实：《我在满洲省委工作一年零四个月》，《哈尔滨文史资料》第7辑，哈尔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15、16页。

^②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193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7页。

^③ 王效明、王一知：《我们所知道的周保中同志》，《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④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1932年6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年）》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

^⑤ 《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关于接受中央北方会议的决议》（1932年7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148页。

^⑥ 《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告同志书——关于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及创建苏维埃政权问题》（1932年7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145—146页。

^⑦ 《中共满洲省委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9月1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116、117页。

^⑧ 张革：《巴彦抗日游击队回忆》，《巴彦党史资料》，中共巴彦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47页。

福海来到巴彦,将游击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同时召开党员干事会“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但作为独立师第一政委的赵尚志,对此坚决予以抵制,为此吴福海指责赵“忠实地执行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给“土匪做忠实的俘虏”。^①在吴的主持下,游击队离开巴彦打土豪分田地,命令部队不加区别地没收地主土地,“大地主、小地主都要打”^②,使“巴彦游击队四面受敌”,原与其并肩作战的当地其它抗日武装也与之分道扬镳。^③由于该部队采取打击所有地主并排斥其他抗日武装的做法使自己日渐孤立,难以在外地立足,最后只好返回巴彦,但“部队已溃不成军,全队已只剩五六十人”。^④1933年初,张甲洲、赵尚志被迫将部队解散,化整为零,巴彦游击队斗争最终宣告失败。赵尚志亦因拒不承担该游击队失败的责任而被满洲省委开除了党籍。

实际上,东北基层党组织对于北方会议决议存在明显的消极抵触情绪。例如在南满,磐石县委对于“拥护红军,拥护苏联,实行土地革命”等要求,“只是在传单上说一说,口头上不敢”。^⑤1933年5月,满洲省委决定在全东北发动大规模罢工,但遭到下级的消极抵制。据中央巡视员报告,哈尔滨一些支部“除个[别]能经常开会外”,其他“连人都不到会”,甚至“听到斗争便吓跑了”。^⑥基层党员出现这些现象,固然有其斗争意志薄弱的因素,但亦有规避高风险盲目斗争的考量。据李实回忆,尽管省委接受了北方会议决议,“但往下传达时就感到很困难,遭到下面支部同志的抵制”。^⑦这种消极情绪在巴彦游击队同样存在。据吴福海观察,当他代表省委传达北方会议决议时,参会者积极性普遍不高:“在开会时,每个同志注意力不能集中,都睡眠朦胧振不起精神来”,“当讨论省委的指示信时,他们一点意见也不发表。以后硬问他们究竟要怎么样,这才逼着似的发出话来”。^⑧可见,北方会议给东北党在该地的抗日活动造成了严重阻碍。

然而,共产国际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此时正悄然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开始对中国东北予以重视,并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逐渐对中共的东北党务工作直接施加影响。为了帮助东北党开展反日工作,共产国际在海参崴设置了赤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特别是1932年3月21日,共产国际决定由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担任该局负责人后^⑨,共产国际对东北党的影响大为加强。1932年6月11日,维经斯基决定为满洲省委提供经济援助,但同时也要求共产国际“派一些能干的同志去加强满洲州委(即满洲省委——引者注)”。^⑩8月16日,维经斯基致函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皮亚特尼茨基(Dyatt Nitschki),建议在“立即毫不拖延地加强满洲的州委”的同时,“派遣成百上千名中国工人、受过我们远东边疆区理论和

① 《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1933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1955年编印,第83、85页。

② 吴福海:《巡视情况(录音)》,《巴彦党史资料》,第7页。

③ 刘贵田等:《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页。

④ 赵俊清:《赵尚志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⑤ 《团满洲省委给团磐石县委的信——关于县委工作中的错误及目前具体工作的指示》(1932年6月3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272页。

⑥ 《仲云巡视满洲的报告第二号——关于反日斗争及党的工作情形》(1932年6月13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380页。

⑦ 李实:《我在满洲省委工作一年零四个月》,《哈尔滨文史资料》第7辑,第17页。

⑧ 《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巴彦游击队事变的经过报告》(1933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第3辑,第88页。

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29号(B)号记录(摘录)》(1932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⑩ 《维经斯基给福京的信(摘录)》(1932年6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69页。

实践训练并经过考验的党员”加入东北党。^① 这实际上成为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东北党事务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成为共产国际修正其对华政策的重要节点。为了防止日本过早进攻苏联，苏联在加紧部署远东地区军事力量之时，也力图通过共产国际调整中共东北党的统战策略。1932年2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东方会议，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使东北的形势与中国南方明显不同，“组织红军或苏维埃区域之类为时尚早”。^② 6月28日，共产国际正式致电中共中央，不再要求在东北实行苏维埃革命，而是以“建立民选国民政权”为目标。同时，电文中不再将所有地主和资本家都列为斗争对象，而仅仅没收“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财产”等。^③ 可见，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的路线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强调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变为联合其他力量共同抗日的发展道路。两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对此亦进行了重申。^④ 然而共产国际对于东北地区统战路线做出的重大修正，并未促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改变原有路线。因为共产国际的电报是在北方会议结束四天后发出的，中共中央的回电目前尚无材料揭示，但其此后并未立刻对东北党的工作方针做出调整确是事实。例如该年12月中共中央仍然指示满洲省委必须实现“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的联系”。^⑤ 而且，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巡视员1933年3月在报告中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⑥

中共中央在东北工作策略转变迟缓直接对东北党开展统一战线造成消极影响，以及两者间因距离遥远、机关迭遭破获等致使东北党不能及时获取前者最新指示的客观现实，使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共中央之外为东北党另觅一个领导机构，使之更便捷地获取其指示。因此，近在咫尺的中共代表团自然就成为首选。^⑦

二、中共代表团与“一·二六指示信”

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决定不再向中国派遣代表，而改为在共产国际设立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主要通过代表团来指导中国革命。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王明为团长的新代表团。^⑧ 作为中共派驻莫斯科的机构，中共代表团的职责为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以及负责领导在苏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并无干预国内党务之权。但王明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①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2年8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01页，第202页。

^② 李铸等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页。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80—181页。

^④ 《革命高潮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185页。

^⑤ 《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193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1页。

^⑥ 《宝锋关于满洲问题的报告——政治形势、省委及党、团工作等》（1933年3月6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9月—1935月）甲66，第261页，第277页。

^⑦ 李庭植也认为，共产国际意图通过王明来集中东北党的力量以便对日作战，同时改变其因反对国民党的做法而被孤立的现状（尽管国民党的势力在东北相对较弱）。参见 Chong-Sik 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p. 164。

^⑧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3（A）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66页。

员、中共代表团团长外,还相继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这种特殊身份使王明既是中共代表,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由于代表团的“近水楼台”及其负责人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地位,使其无形中取得了能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名义向党内外发布通告、宣言及指示的政治优势。这也是中共代表团能将“一·二六指示信”以中央的名义发给东北党,而中共中央对此亦予以承认并转发全党的原因所在。^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东北党提出完全不同的统一战线策略后,中共代表团由此开始了对东北党的直接干预。

为了尽快改变东北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1932年底,王明起草了致东北党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在经共产国际批准后^②,于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经海参崴转给满洲省委,史称“一·二六指示信”。该指示信的到来,成为中共代表团直接干预东北党务的开端。它标志着东北党的上级领导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双重领导时期。“一·二六指示信”洋洋万余言,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总体情势、东北目前各路反日武装的性质与前途、东北党在东北的战斗任务,以及东北党政治与组织的巩固对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意义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团针对东北抗日武装的不同性质确定了不同程度的统战政策。^③可见,代表团尽管没有否认下层统一战线的合理性,但认为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订立联合作战协约或反帝联盟的方式实行上层统一战线。虽然该指示信并未直接否定中共中央所批判的“上层勾结”问题,但与其他抗日武装订立协约或联盟,不经过其上层领袖是不可能的。可见,与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对“上层勾结”坚决反对的态度不同,“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指出了在某种情况下实行“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较之北方会议决议,“一·二六指示信”更加符合东北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接到该指示信后,满洲省委立即于1933年4月召开扩大会议对此信展开讨论,认为尽管该信“不是直接由中央送给”,却是“非常正确的”,“省委完全的一致的同意”。^④同时省委开始对既往的工作路线逐步进行纠正。^⑤“一·二六指示信”的关键在于明确肯定了“上下层联合”的统一战线,更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⑥事实证明,东北党对“一·二六指示信”的贯彻执行,对自身生存及发展影响颇大,不仅迅速改变了其孤立无援的窘境,还使自身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据李范五回忆,他当时在穆棱县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在接到了该指示信后,其工作局面随之打开。^⑦

^① 1933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将该指示信转发全党,要求特别是“华北的党把这一信中所指出的任务与策略适宜的应用于目前的实际斗争环境中”。《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3年)》第9册,第44页。

^② 1933年1月7日,王明致函库西宁(Kuusinen,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要求其尽快阅读与审定《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一文。由此可知,该文的起草不应该晚于1933年1月初,且其发出经过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参见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

^③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现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3年)》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1页。

^④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接受由国际方面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4月16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47页。

^⑤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绥宁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关于省、县委过去的错误和当前中心工作任务》(1933年6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132页,第133页。

^⑥ Chong-Sik 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p. 163.

^⑦ 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李范五(1912—1986),先后担任宁安县委书记、吉东特委组织部部长以及特委书记等职务,1949年后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

从“一·二六指示信”的来源及传递渠道来看，东北党的上级领导已在悄然发生变化。该指示信是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东北党的，尽管中共中央后来对该指示信表示同意并将其刊登在中央刊物《斗争》之上^①，但东北党由此开始从接受中共中央的单独领导转为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双重领导。正如前文所言，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之间出现政见分歧，必然会对东北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代表团之所以介入东北党务工作，背后起作用的仍然为共产国际。为了使东北党更加便捷地获取指令，共产国际决定在东北党内设置一个直接向满洲省委传达指令的机构，这就是吉东局。

事实上，设立吉东局的最初构想亦来自维经斯基。1932年8月16日，维经斯基首次提出对东北党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造。他除建议继续加强满洲省委的力量外，“或许在东满，如在穆棱建立特委”。其理由之一即是该地为“满洲与间岛（即今延边地区——引者注）的结合部，那里的游击运动正在日益发展，而日本人打算从那里进攻滨海地区”。^② 维经斯基此语说明了设立该特委的理由，日本将从该地进攻“滨海地区”，该特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滨海地区的屏障，阻挡日军由此地进攻苏联。但实际上，共产国际后来在穆棱设立的“特委”——吉东局，除了肩负领导该地的抗日义勇军阻挡日军攻苏的使命之外，“直接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意图和决策，是要影响满洲省委的方针和策略”^③，即搭建由满洲省委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之间的联络渠道，是其另一重要任务。所谓吉东，为吉林省东部之意。吉东局所处的位置与海参崴较为接近，届时可非常便利地接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④

而向满洲省委正式提出设立吉东局这一建议的是省委巡视员孙广英。孙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大连团省委宣传部部长，11月赴海参崴及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后，1932年9月，孙广英受中共代表团派遣，以满洲省委巡视员^⑤的名义来到东北，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并巡视绥宁等地的工作。^⑥ 1932年11月，他在视察吉东各县后，由绥宁前往海参崴，在吴平（即杨松）^⑦的联络下，孙与中共代表团一位负责人会面“共同研究在吉东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的问题”，即在穆棱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党委员会”，名为“吉东特委或吉东局”，然后由孙返回东北征求满洲省委的意见。^⑧ 12月，孙广英返回东北即向满洲省委提交报告，建议在穆棱“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党委员会，指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名为吉东特委或满洲省委吉东局，在省委的

① 参见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编《斗争》第18期，1933年7月15日，第1—5页；《斗争》第19期，1933年7月25日，第14—16页；《斗争》第20期，1933年8月5日，第14—16页。

②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2年8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02页。

③ 李鸿文：《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销》，《党史研究资料》第5辑，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85年编印，第406页。

④ 对于中共代表团此后主要通过吉东向东北党组织发出指示的原因，韩光亦认为是“吉东地区独有的‘地利，交通联络方便，即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参见韩光《党史工作意义重大，主动服务义不容辞》，《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7页。

⑤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代表团加强了对东北党事务的干预，时常以“满洲省委巡视员”为名义向东北党派出工作人员，传达共产国际和代表团的指令，这种绕过中共中央甚至满洲省委直接向东北（中心）县委下达指令的方式，使东北党务工作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复杂。

⑥ 李鸿文：《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销》，《党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405页。

⑦ 杨松（1907—1942），原名吴绍镒，湖北人，早年参加青年团，1927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1933年，担任海参崴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后调莫斯科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1934年7月化名为吴平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东北担任吉东特委书记。参见陈光旭等《杨松》，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94页。

⑧ 《牡丹江市地方近现代史史料丛书：沃土丰碑》，牡丹江市地方近现代史史料学会1997年编印，第36页。

直接指导下,来统一此数处的工作”。为了尽快成立吉东局,他建议满洲省委“立刻调大批干部来,如没有,可向中央及共产国际要求,在俄国远东有很多可以派来”。^①可见,孙广英在此扮演了为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党传递信息的角色。

为了尽快落实共产国际相关决议,1932年12月初,在前往满洲省委驻地哈尔滨之前,孙广英即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在穆棱召开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会议,并通过《绥宁中心县委关于绥宁政治局势和党迫切任务的决议》。该决议一些内容与北方会议决议大相径庭,例如反对过早提及组建红军与苏维埃,而是组建“工农义勇军”“民众的革命政府”等。^②可见,该决议明显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影响。但满洲省委接到该决议后反应颇为激烈,针对其反对过早提出建立红军及苏维埃的主张,质问道:“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然则什么时候方可应该提出呢?亲爱的同志们,是时候了!不是群众的落后,而是你们的落后,你们之过迟呵!”同时,针对孙提出建立“民众的革命政府”作为向苏维埃的过渡政权,更是严厉指责:“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政权!”针对其设立吉东局的建议,满洲省委并未明确表态,而是要求孙立即返回省委,以便对其分工“再作具体的讨论”。^③可见,满洲省委对于设立吉东局一事并不积极。直到1933年3月,满洲省委收到由孙广英从海参崴转来的“一·二六指示信”后,才正式决定设立吉东局,以孙为书记,负责“管理绥宁一带,虎林饶河、东满各地党部”,并增补孙为省委委员。^④可见,吉东局的成立,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

吉东局成立后即在中共代表团和满洲省委之间扮演了重要的信息传递角色。就国内形势而言,1932年底中共中央开始从上海陆续迁入中央苏区。如此一来,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及东北党之间的联络逐渐减少,而中共代表团则开始逐渐接管满洲省委。代表团对东北党的信息传递渠道大致可以描述为:中共代表团→代表团驻海参崴交通站→吉东局(特委)→满洲省委(东北各级党组织)。^⑤除了承担信息传递外,吉东局还负责转交中共代表团拨付给满洲省委的活动经费。^⑥可见,吉东局在东北党与上级联络中占据枢纽地位,甚至因其获取上级信息及经费的转交权成为中共代表团领导东北党的重要支点。

吉东局的这种特殊地位,亦是日后被满洲省委撤销的重要原因之一。^⑦然而,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此后围绕东北地区的统一战线问题存在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弭,最终导致满洲省委被撤销。

^① 《孙××关于东满政治局势、党的活动及有关要求建议的巡视报告》(1932年12月9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435页。

^② 李鸿文:《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销》,《党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405—406页。

^③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等问题给绥宁孙巡视员及绥宁中心县委的信》(1933年1月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第42—54页。

^④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党的组织、干部及工作等情况给中央的信》(1933年4月2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76、77页。

^⑤ 据李范五回忆,到1934年末满洲省委与上海中央局失去联系后,中共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信及重要文件,均是从海参崴转入吉东,再由吉东转给满洲省委或者东北党组织。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第143页。

^⑥ 《中共满洲省委洛为米亚、光华速回事给春山的信》(1935年9月27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117、118页。

^⑦ 实际上,满洲省委对于吉东局在东北党中的特殊地位始终颇为不满,早在1933年冬,满洲省委就有“原则上取消吉东局”之议,但可能顾忌到中共代表团及共产国际对此的反应,才“决定延期执行”。1934年4月,吉东局因因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被捕叛变而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孙广英避走辽宁(后脱党),满洲省委借此将吉东局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取消吉东局的决定》(1934年6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35、36页。

三、政见冲突的后果：满洲省委被撤销

尽管“一·二六指示信”有效推动了东北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但并未迅速扭转北方会议以来东北形成的统战路线。满洲省委虽然接受了该指示信，但仍然对其中的统一战线论述并不完全认同。据李实回忆，指示信到达东北后，满洲省委内部是否继续坚持苏维埃革命还发生了争论。与省委大部分成员的观点不同，何成湘（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即认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例如南满的磐石、海龙地区），“应继续搞苏维埃”。^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尽管这封信是王明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但它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对于满洲省委而言，其直接上级仍然是中共中央而非中共代表团。

通常而言，中共代表团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指示，常常由中共代表团转达。由于“近水楼台”，身处莫斯科的代表团往往能迅速捕捉到共产国际政策调整的最新信息，而远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却显得“步履蹒跚”。在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下，一旦两者出现意见分歧，满洲省委将难以适从。例如，尽管中共中央1933年6月9日即在党内转发了“一·二六指示信”，但20日仍然对满洲省委“幻想国民党军阀而采取投降路线”（即所谓“上层勾结”——引者注），不愿使用“下层统一战线”控制义勇军领导权的做法进行了批评^②，即“要求东北也与关内一样搞苏维埃革命”。^③中共中央对东北党“上层勾结”的批评，明显与“一·二六指示信”中“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的内容相冲突。^④可见，中共中央在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后，仍然坚持在东北进行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因为此时中共中央在南方正全力反“围剿”，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却要在东北放弃土地革命转而与敌对方合作，这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此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仍然要求东北党“必须将反日斗争与发动土地革命连接起来”。^⑤毫无疑问，这种继续“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明显与“一·二六指示信”中联合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的精神相抵牾。此外，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根据刚闭幕不久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精神，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史称“二月指示信”）。中共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虽然大力肯定“一·二六指示信”的正确性，但批评满洲省委未能正确理解“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将吉东、北满等地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组建司令部的做法斥之为“上层勾结”，并还要求“将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⑥可见，该指示信重点仍然在于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和苏维埃革命方针。满洲省委接到该指示后，立即在东北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即反对“上层勾结”，进而使东北党逐渐好转的

① 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李实：《从“北方会议”到“一·二六指示信”》，初兴佳主编：《中共满洲省委八十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何成湘此时已从宣传部部长再次转任组织部部长。

②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1933年6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③ 罗章龙：《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罗章龙回忆录》下册，第688页。

④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3年）》第9册，第25、31页。

⑤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通过》，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编：《斗争》第47期，1934年2月16日，第14页。

⑥ 《满洲反日战争中的党的任务——中央给满洲省委信》（1934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编：《斗争》第60期，1934年5月19日，第10、14页。

统一战线局势再度蒙上了阴影。^①

据李范五(时任宁安县委书记)回忆,1934年4月6日,团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小赵以省委代表的名义抵达宁安,传达贯彻省委反“右倾”的指示,认为“宁安县的统一战线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一条完全与党中央、满洲省委的反帝统一战线相反的错误路线。在抗日武装里,介绍入党大部分是军官,士兵入党比例少”。^②在省委代表的主持下,宁安县委开除了义勇军将领于逢源与邓吉生的党籍,这直接导致宁安县抗日力量的“消极”,例如宁安反日总会会长孟仁甫转而去当私塾先生,“整天忙于教小孩子《三字经》和《百家姓》,很少过问反日会的工作。他的思想顾虑就是将来有一天反右倾会反到自己头上”。^③同时,宁安县委还收缴一些抗日友军的枪械,引发各山林队集体不满。^④在密山县,一些在其他抗日游击队内的共产党员,鼓动下层士兵反对游击队首领,结果遭到驱逐。^⑤可见,满洲省委的反“右倾”使基层党组织陷入孤立,不仅无法有效开展社会动员,反而有再次面临四面楚歌的危险。

满洲省委反对“上层勾结”及其强调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阶级斗争的做法^⑥,对业已在东北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造成了严重破坏。为此,中共代表团于1934年9月特地派遣吴平前往东北纠正这一问题。他在抵达吉东等地后,明确指出“在盘(石)、珠河、吉东等地和其他反日队伍建立的共同的总司令部不是上层勾结,而(是)上层联合战线”。^⑦他在巡视吉东党后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将“吉东局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完全纠正过来”,在“广大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展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以具体情形,得实行上层联合”。^⑧很显然,在这个报告中,吴平看似在指责前吉东局“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但实则是不指名地批评满洲省委。同时,他还前往密山县传达《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是不矛盾的”。^⑨他并且以吉东局的名义(吉东局已于该年6月被满洲省委取消)致函饶河中心县委,明确要求巩固与各类反日武装建立的抗日总指挥部,该机构“不能[被]叫作上层勾结,它正是目前统一战线的机关”,鼓励其对一切反日队伍“采取上层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⑩在吴平的推动下,密山、穆棱、宁安等县及饶河中心县委、东满特委,相继转变了工作方法,积极扩大统一战线。可见,他的到来,对于纠正此时东北党内部的诸多偏差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吴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重建国内东北党与中共代表团的联络站——吉东特委。自1934年6月吉东局被满洲省委撤销后,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党之间的直接联络中断,代表团决定在

① 有关“二月指示信”给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造成消极影响的论述,参见郭化光《“二月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战争的危害》,《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第205页。

③ 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第235页。

④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平)的报告——宁安的一般情形、日满匪军的“讨伐”与游击运动的发展、地方工作及一月来工作的布置等》(1935年2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107—108页。

⑤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报告——关于吉东反日民族革命运动、党的工作成绩、错误与工作的转变及布置等问题》(1934年10月2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261、262页。

⑥ Chong-Sik L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p. 183.

⑦ 《吴平致陈亚的信——关于纠正吉东党组织的错误及改造各县党的机关等问题》(1934年12月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1990年,第352、356—357页。

⑧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报告——关于吉东反日民族革命运动、党的工作成绩、错误与工作的转变及布置等问题》(1934年10月2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261、268页。

⑨ 骆宾基:《李延禄将军的回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⑩ 杨松:《中共吉东局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1934年10月10日),《杨松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原来吉东局的基础上重建吉东特委。为此，吴平致函满洲省委，告知他此次来吉东，代表团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政治上纠正吉东局领导下党组织的‘左’倾错误”，并组建吉东特委，由他担任书记，“在组织上接替已被破坏的吉东局对这个地区的领导”。^① 1935年2月，吉东特委正式成立，吴平自任书记，驻地设在牡丹江，负责与莫斯科的通信联络。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受哈尔滨满洲省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实际工作是由中共中央代表[团]直接领导”。^② 此外，吴平除了要重建吉东特委外，还奉命“改造各地的领导机关”，即“首先建立四特委（珠河特委、磐石（××）特委、吉东特委、东满特委）”，要求“首先注意这四个游（击）区内四特委之领导”，他甚至还以“（满洲）省委本身机关注意秘密工作”为由，建议对省委组织进行改造，“常委只三人设立”。^③ 从后来的发展趋势看，吴平设计的四个特委，恰好就是满洲省委撤销后，北满、南满、吉东等省委成立的基础。可见，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考虑对东北党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

依据职能划分，代表团本无改组满洲省委之权。中共中央发出的“二月指示”，为前者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远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得到该指示信后，当即于9月16日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称准备就几个问题给满洲党发出文件，并希望中共中央在未得到这些文件之前，“不要写给满洲省委关于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许多主要策略问题，两方面的文件时常有不一致的意见”，并指出“二月指示信”存在“许多策略问题不正确”之处，“即将来新文件也不能同意罗某（即李维汉——引者注）起草信中的某些意见”，它将“使满洲同志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④ 由于此时中共中央面临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压力正在准备撤离江西苏区，所以在收到该电文后随即将东北党的领导权移交给中共代表团。^⑤ 至此，满洲省委步入由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时期。

然而此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34年4月，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杨波被捕叛变，导致满洲党和团省委、哈尔滨区委、工会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前后被捕主要干部达四十余人”。^⑥ 应中共代表团的要求^⑦，上海中央局派遣杨光华等人于1934年10月前往东北重建满洲省委，在新担任常委的四人中，除组织部部长赵毅敏（化名刘焜）外，其余均由上海中央局所派。但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局亦因叛徒出卖而遭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人也随之叛变。这就引起了中共代表团对于杨光华等人的怀疑：“上海中央局破坏光了，到底是什么人派他到满洲省委呢？”^⑧

事实上，自1934年4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后，中共代表团就开始怀疑其内部存在“内奸”，王明于次年5月3、5日给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刘仲华写信指出，从近年来上海中央局遭到的几次大破

① 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第286页。

②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吉东省委抗联第二路军情况和问题的答复》（1941年1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0，第107页。

③ 《吴平致陈亚的信——关于纠正吉东党组织的错误及改造各县党的机关等问题》（1934年12月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352、359页。

④ 《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44—245页；郭德宏：《王明年谱》，第272页。

⑤ 《中共中央给盛忠亮的电报》（1934年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66页。

⑥ 李鸿文：《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销》，《党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403页。

⑦ 《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45页。

⑧ 《康生给中组部的信》（1954年9月4日），《辽宁党史资料·中共满洲省委专题史料汇编》第1辑，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150页。

坏来看，“内奸是最主要的原因”。^①因此，杨光华等人一开始就无法取得代表团的信任。^②1935年2月底，代表团紧急致电满洲省委，“要求把省委负责人都调去苏联莫斯科讨论满洲党的工作，并做好文件的处理”。^③省委对此行的后果似乎有所预料，1935年4月5日，杨光华在临行前代表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团应经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④该指示信实际上成为满洲省委历史终结的前奏。

1935年7月，吉东特委收到以王明与康生名义于6月3日发给东北党的《关于游击运动问题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史称“六三指示信”），再次强调东北党须注意纠正“上层勾结”的错误观点，而“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值得注意的是，王、康二人在信中要求吉东特委将该指示“迅速、安全地转发给东北各地党组织”。^⑤可见中共代表团已经不再信任满洲省委，而是通过吉东特委切断满洲省委与东北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同时，此信透露出将对东北党的组织结构进行重大改组的意图：“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党的机关一部设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的机构（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的区域，使之能灵活地巧便地独立工作，适合于战争环境。”^⑥“改造党组织庞大的机构”“缩小管理的区域”等字句，已经预示着满洲省委接下来的命运。

1935年底，王明等人通过海参崴交通站通知吉东特委，称满洲省委有内奸，要求“火速转告东北各特委、各军党委立即切断与满洲省委的一切联系，并要吉东特委与各地保持联系”。时任吉东特委代理书记的李范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全东北党组织传达该精神（史称“吉特补充信”）。^⑦1936年3月12日（一说为2月），中共代表团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名义发出《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史称“中代信”），这封信除了再次强调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外，并正式决定“改变过去死板的结构”而“将过去满洲省委（哈尔滨）取消”，以四个大游击区为中心组织南满、东满、吉东等省委。^⑧1936年6月，留守省委工作的小骆（张文烈）在赴苏联之前，给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信中宣布：“从现在起中共满洲省委正式取消。”^⑨由此，满洲省委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余 论

中共六大以后向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团，其因所处地利之便及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政

① 郭德宏：《王明年谱》，第284页。

② 时任代理满洲省委书记的杨光华奉命前往莫斯科后，1935年五六月间王明、康生即对其展开了审查，并了解他在上海被捕时的情况。参见郭德宏《王明年谱》，第285页。

③ 杨光华：《记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哈尔滨文史资料》第7辑，哈尔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7页。

④ 《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1935年4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⑤ 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第298页；郭德宏：《王明年谱》，第286页。

⑥ 《王明、康生关于游击运动问题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1935年6月3日），《辽宁党史资料·中共满洲省委专题史料汇编》第1辑，第211页；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⑦ 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第302、303页。

⑧ 《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1936年2月12日），《辽宁党史资料·中共满洲省委专题史料汇编》第1辑，第157页；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回忆录》，第312页。

⑨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8页；杨光华：《撤销满洲省委前后》（1982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3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5年编印，第242页。

治地位，无形之中扮演了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角色，并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直接向地方党发出指示。但中共代表团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当他们政见一致时，固然有助于地方党及时、高效、快捷地获取指令，但一旦政见分歧，必将使地方党务工作进一步复杂化。

以统一战线政策为例，由于“近水楼台”的原因，中共代表团能及时从共产国际获取策略方针，调整信息进而提出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处于“天水之隔”的中共中央，却仍然坚持旧有路线，尽管也将代表共产国际意图的“一·二六指示信”转发全党，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表态式的，而非及时调整方针，其有关统一战线的政策实际上体现在此后的“二月指示信”之中。当分别来自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与“二月指示信”先后到达东北，围绕开展苏维埃革命及统一战线的范围问题产生争议之时，东北党便成为矛盾的焦点。满洲省委被撤销，表面上看似此乃中共代表团为提高各游击区域之间灵活性、自主性以“适合于战争环境”的考量，但实则是这种分歧的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执掌中共中央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深厚共产国际背景的博古等人。在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传递信号，即在东北停止苏维埃革命路线，而开展上下层相结合的统一战线后，博古等人为何仍然拒不改变旧有策略？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者所面对的实际局势予以分析。此时苏联为了避免过早与日本作战，希望中共在东北展开上下层相结合的统一战线，力图使东北的武装力量尽可能地将日本拖住，不使苏联过早遭到进攻，但远在江西的中共中央此时正面临国民党的重兵“围剿”，自己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要主动放弃在东北的既定苏维埃革命路线，转而与该地的奉系乃至国民党等政治力量进行合作，这种转换对于此时的中共中央而言无疑是困难的。面对这种分歧，满洲省委选择了与其直接上级中共中央而非代表团保持一致，这无疑是“下级服从上级”组织铁律的直接反映。因为中共中央此时尚在南方揭橥“苏维埃革命”大旗，代表团却令东北党在外“改旗易帜”，这种转换对于满洲省委同样困难。满洲省委的选择，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是追随，但对中共代表团却是背离。

为了对东北党有效施加影响，中共代表团在满洲省委之下设立吉东局（特委）这个二级机构。该机构的设立有助于代表团与东北党之间建立一条非常规的信息传递渠道。但正因吉东局拥有代中共代表团传言的优势地位，有时难免表现出对满洲省委的轻慢，使后者对其始终心存芥蒂。^① 这不仅可从满洲省委后来借故将其撤销中看出端倪，而且在对吉东局工作的支持上，满洲省委也显得较为消极。^② 回顾吉东局自成立到撤销的基本史实，我们不难发现，吉东局与满洲省委之间的意见分歧，实为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意见冲突在东北的“缩微版”。

在吉东局被撤销后，王明等人派出吴平和王德（任职于海参崴太平洋职工国际秘书处）以“省委巡视员”的名义进入东北视察工作。王德1935年3月在给代表团的报告中直接指出满洲省委的问题：“省委还是保持许多旧式观点，关门主义的错误还是很严重的，有些组织正在扩大这种错误。”不仅如此，满洲省委还对吴平在巡视吉东地区期间的“工作的布置和所推行的路线有许多不

^① 自1933年5月吉东局正式成立后，直至12月才向省委报告工作，一度导致后者的不满。为此，时任吉东局书记的孙广英也不得不承认：“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对报告的忽视。”参见《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33年12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第55页。

^② 据报告，吉东局刚成立时仅三人，由于三人分工不同，以致“事实上没有集体的领导过工作，在七月到九月间曾多次要求省委派一人来帮助工作，始终没有”。《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33年12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第103页。

正确的批评”。王德建议：“我想你们已估计到，省方问题不能延迟，必须要迅速解决！”^①鉴于满洲省委的实际表现，中共代表团最终决定借助组织手段解决此类分歧，即撤销满洲省委并将东北党分为北满、吉东、南满省委和哈尔滨特委，均直属中共代表团领导。^② 满洲省委被撤销，固然有利于迅速贯彻共产国际相关统战政策，推动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的联合，但此后一分为四的东北党，却陷入各自为战的不利境地。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对手的“三个法宝”。^③ 20世纪30年代因共产国际相关策略的调整，使东北成为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期实施区域，并为此后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④ 一直以来，我们所熟知的是，共产国际距离中国遥远，无法就中国国内瞬息万变的局势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以致对中国革命造成消极影响。但本文所涉情形恰好相反。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尤其是在东北）做出的及时调整，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中共中央却难以跟上步伐，仍然坚持苏维埃革命及“下层统一战线”，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的召开。这也正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复杂之处。需要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对于在东北开展“上下层”相结合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向，是以苏联自身利益调整为其思想渊源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巩固外交利益，俄国甚至不惜牺牲外国共产党的利益”^⑤，但这种政策转向却“意外”地使身处窘境的中共东北党再次焕发生机。不仅如此，东北党直属于中共代表团的这种特殊组织安排，后来竟为中共中央解决与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分歧提供了重要借鉴。^⑥ 关于此点，却是共产国际所始料不及的。

〔作者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郭阳）

① 《程字通信第四号——关于饶河、东满、吉东特委的工作情况及干部、经费给王明、康生的信》（1935年3月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355—356页。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第3卷（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8页。

③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④ 杨松：《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938年3月15日），《杨松文集》，第290页。

⑤ 伦纳德·夏皮罗著，徐葵等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⑥ 1936年初，张浩（林育英，曾以“林仲丹”之名任满洲省委书记）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后，为了促使南下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尽快领兵北上，与张闻天分别电告处理其与中共中央之间纠纷的方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张国焘对此亦表示“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1936年1月24日）、《中央为党内统一并挽救张国焘希其放弃第二党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致张国焘等电》（1936年1月24日）、《对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等意见》（1936年2月14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5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6年编印，第476—478页。